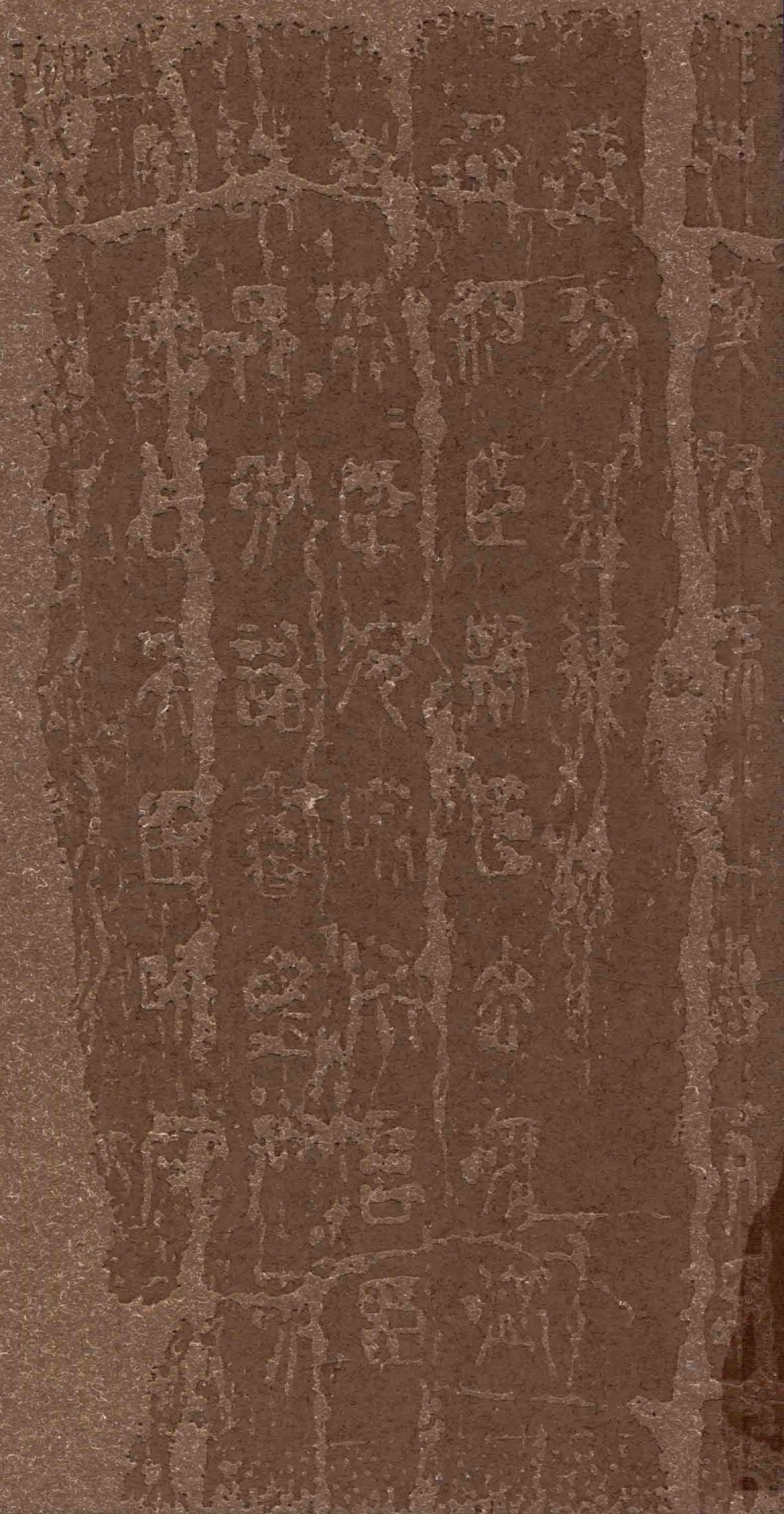


卷壹
秦漢碑刻

《山東石刻分類全集》編輯委員會

山東石刻
分類全集



青島出版社
山東文化音像出版社

山東石刻分類全集

四
共
青
八
十
五
九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山東石刻分類全集·第二卷, 秦漢碑刻 / 《山東石刻分類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青島: 青島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36-9329-6

I. ①山… II. ①山… III. ①石刻—山東省—圖錄 ②碑刻—山東省—
秦漢時代—圖錄 IV. ①K877.402 ②K877.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075944號

《山東石刻分類全集》編輯委員會

學術顧問 馮其庸 歐陽中石

主任 謝治秀

副主任 由少平

委員 (按姓氏筆畫排名)

王永波 王卓明 孔祥林 包海巖
李崇峰 李靖 楊愛國 孟鳴飛
陳安寧 高繼民 張廣存 萬良
焦德森 蔣英炬 管國志 賴非

主編 謝治秀

副主編 管國志 楊愛國

分卷主編 焦德森 賴非 張廣存

楊愛國 萬良 陳安寧

出版人 孟鳴飛 包海巖

序言

齊魯大地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漫漫歷史長河在這裏孕育了燦爛豐富的文化。山東古代石刻藝術，作為齊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文字、書法、繪畫、雕塑等多個方面，是進行歷史研究、考古研究十分難得的珍貴資料，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

山東是石刻文物資源大省，珍藏和擁有古代石刻數量在全國首屈一指。石刻文物不僅時代長、遺存數量多，而且種類豐富，遍佈全省各地。漢代畫像石、漢魏碑刻、北朝佛教造像、摩崖石刻等等，都在全國迺至世界範圍內享有盛譽。石刻文物內容涵蓋了中國古代及近代政治、經濟、軍事、民族、文學、人物、科技、宗教、民俗、教育、地理等各個方面，堪稱中國古代史料特別是山東地區史料的百科彙典。

石刻，作為人類文化的記載，有著極高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自古以來吸引著眾多名人志士的關注。石刻文獻又由於其製作的特殊性，比之紙質文獻而極少出現誤、訛、衍、脫、偽等現象，其原始性和真實性向為學界所重。一些學者專心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金石學』，出現了一批影響深遠的金石學家和專著，宋代青州的趙明誠和他的《金石錄》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石刻藝術，承載著時代變遷的精神內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應該發揮更大作用，充分展示其新的時代意義。古代石刻是不可再生的歷史文化資源，一方面要認真保護好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以對歷史和未來高度負責的態度，確保使之能永續傳承。同時要認真研究好這些歷史資料，深入挖掘其豐富的內涵，合理利用這一文化資源的歷史價值、科學價值和社會價值。要正確處理搶救保護和開發利用的關係，在繼承、弘揚和創新中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新時代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鼓舞人民前進的精神力量。

在山東省文物局的領導和支持下，山東省石刻藝術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經過多年的努力，把全省範圍內現存唐朝之前的石刻資料調查傳拓一遍，又經過認真細緻的室內整理，將最有代表性的『秦漢碑刻』、『漢畫像石』、『雲峰刻石』、『北朝刻經』、『佛教造像』、『漢唐墓誌』結集出版，名之曰《山東石刻分類全集》。它集中了山東古代石刻藝術最精華的內容，填補了多項山東迺至全國的空白。它的出版，對於弘揚和傳播齊魯文化，擴大齊魯文化影響力，推動實施齊魯文化走出去戰略，促進山東省文博事業的繁榮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祝賀它的付梓，更希望山東全省文物工作者再接再厲，繼續發揚優良傳統，做好基礎資料的搜集、整理和開發利用工作，為加快經濟文化強國建設積極貢獻力量。

單霽翔

二〇一三年四月

《山東石刻分類全集》編輯凡例

一、本書集萃了山東古代石刻的精華（秦至唐），依內容分爲八卷：第一卷爲《秦漢碑刻》，第二卷爲《雲峰刻石》，第三、四卷爲《北朝佛教刻經》，第五卷爲《歷代墓誌》，第六、七卷爲《漢代畫像石》，第八卷爲《佛教窟龕·單體造像》。

二、各卷條目排列次序依本卷內容而定，其中《秦漢碑刻》、《雲峰刻石》、《歷代墓誌》以時間爲序，《北朝佛教刻經》、《漢代畫像石》、《佛教窟龕·單體造像》以地域爲序。

三、本書收錄石刻一千餘種、圖片两千五百餘幅，多是據山東省石刻藝術博物館館藏拓本新拍攝的，少數來自其他圖書，個別爲編者考察過程中親自拍攝的，反應的多是實物的現狀今貌，以供讀者瞭解和研究。

四、拓本釋文（包括用字和格式）一從原拓，對於個別原刻缺損較多者，其釋文依傳世文獻補錄或錄以全文。行文中保留了許多異體字和舊字形以直觀反映石刻文字原貌，同時保持整套書文字風格的統一。

《山東石刻分類全集》編輯委員會

二〇一三年四月

山東石刻分類全集

本卷主編 萬良

第一卷 ● 秦漢碑刻

青島出版
山東文化音像出版社

我國古代文化史上曾創造了大量石刻藝術作品，它們對古代文字、書法、繪畫、雕塑、考古、科技，乃至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歷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是難得的珍貴資料。古代石刻歷史悠久，上溯先秦，下至明清，遍佈全國各地。就現存的文字書法刻石來講，早期的（唐以前）作品以陝西、河南、山東三省最爲豐富集中。陝西以唐碑稱最，西安碑林所藏爲其大宗；河南以北朝造像題記和墓誌爲多，龍門題刻、邙山墓誌是其代表；山東地區則以秦漢碑刻、雲峰刻石、北朝佛教摩崖刻經最爲著名。

山東地區的秦漢碑刻數量約占全國總數的一半左右，尤其是秦與西漢時期的作品，更是他省區難以比肩的。秦漢時期的山東一帶是全國重要的經濟發展區，且又是孔孟故鄉，實爲傳統文化非常發達的地方，因而有條件、有環境鐫刻如此衆多的碑刻。目前保存下來的有七十多種，其中早年出土的三十多種，新近出土的三十多種。曾見於著錄、原石已佚的六十五種。

一 漢碑的起源、形制與發展

依據內容，碑可以分爲墓碑、功德碑、紀事碑、典籍碑、造像碑、題名碑、宗教碑、地圖碑、書畫碑。其中，尤以墓碑出現時代早，延續時間長、遺存數量多，故而我們談碑的起源，實際上是以墓碑爲對象的。

（一）關於碑的原始概念

古代典籍中關於『碑』的概念及用途，主要有以下幾種記載。

第一，《儀禮·聘禮》：『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鄭玄注：『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又，《儀禮·

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庶羞陳於碑內，庭實陳於碑外，牛、羊、豕陳於門內。』

第二，《禮記·祭義》：『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鄭玄注：『麗，猶繫也。』《儀禮·聘禮》鄭注也云：『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孔穎達疏：『君牽牲入廟門，繫著中庭碑也。』

第三，《禮記·檀弓下》：『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玄注：『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繚繞。天子六繚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桓楹）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繚二碑，碑如桓矣。』《禮記·喪服大禮》鄭玄注曰：『……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繚繞碑間之鹿盧，挽棺而下之。』

第一類文獻中所說的碑，是立在宮中用以『識日景』、判時間的裝置，以石質或木質爲之。第二類文獻中所說的碑，是立在宗廟大門內外拴繫牲口的樁子，或石質或木質。第三類文獻中所說的碑，是裝置轆轤用以控制下棺的木柱，當爲木質。三類碑中，識日景之碑不可能用來繫牲，因爲識日景務求準確，一旦繫牲，難免晃動。二者更不可能藉以下棺，下棺之碑需要粗壯，更要有一定長度。可見，古人雖將這三物統名曰碑，而事實上，它們不管是設置的位置、目的，還是用途、意義，均風馬牛不相及。顯然，周人對碑的概念含義是寬泛而模糊的。

周代以後，很長時間不見有人對碑進行義辨。漢許慎《說文解字》說：『碑，豎石也。』這一更加寬泛的說法，與鄭玄對碑不加析辨的注解相比，使後人更加模糊了碑的內涵和外延。事實上，東漢出現了那麼多碑，當時人們對下棺之碑與識日景之碑、繫牲之碑的區別，肯定是心中有數的。漢劉熙《釋名·釋典藝》說：『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謂之碑也。』這段話不僅把下棺之碑與其他『碑』區別開，還將下棺之碑的用法和它如何轉意爲墓碑的原因、過程，闡釋得合情合理、準確明瞭。現在的問題是，下棺之碑爲什麼寫上了『君父之功美』，它是受了他事何物的影響，從而轉變成了墓碑的呢？

（二） 碑之淵源

我們認爲，下棺之碑書寫『君父之功美』的作法，是下棺之碑轉變爲墓碑的關鍵一步。而在書寫『君父之功美』之前，首先是把下

棺之碑作爲墓的標誌而留豎在墓坑邊上。顯然，這是誌墓風俗的內容之一。

人們爲了便於到墓前祭祀死去的人，給墓葬作上標誌是由來已久的，先秦人即曾以墓表作爲標誌物。《周禮·秋官·蠟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楬，即木椿。《太平御覽》即載燕昭王墓前有華表。西漢時期，墓表仍然使用。《漢書·淮南厲王劉長傳》記載，劉長謀殺士伍開章後，『葬之肥陵……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顏師古注曰：『表者，豎木爲之，若柱形也。』《漢書·尹賞傳》：『楬著姓名。』師古注曰：『楬，杙也。楬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這書寫死者姓名的木椿，是由下棺之碑轉而利用的，還是爲書表而專門設置的楬呢？當然這就很難考證了。事實上，一直到東漢，仍然還有人習慣地將碑稱作『表』，這似乎已經揭示了碑與表難以區分的原本關係。至少可以說，下棺之碑在向墓碑轉化中，『表』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

對墓碑的形成，影響至要的還有明旌。明旌起源很早，周代已常用之。《禮記·檀弓》載：『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明旌的材料多種多樣，《儀禮·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甘肅武威漢墓中出土了數幅西漢明旌，絲或麻質料，朱或墨書。它的作用，除爲墓葬作出標識外，還有顯其魂、彰其美的功用和目的。《易》載：『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翬之飾，表以旌銘之儀……』『表，識也』，『表，顯也』，漢碑中常見的『立此碑銘，以表景行』語，就是這個意思。彰顯功美的明旌，不論麻質或絲質，皆易損滅，鏤之於石，便可解『損滅』之憂。我們從《梁相費訊碑》中『刊銘玄石，旌勒厥美』的話中，就可看出碑的形成與明旌有多麼直接的關係。武威出土的漢代明旌曰：『姑臧北鄉閭道里壺子梁之「柩」』。『平陵敬事里張伯升之柩，過所毋哭。』它們與西漢河平三年（前二六年）應孝禹碑的內容、格式有很多相似或相同的地方，說明最初的碑文受明旌文的影響很大。

（三） 漢碑的發展

歐陽修《集古錄》云：『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塚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而事實上，石質墓碑在西漢即已出現。《西京雜記》云：『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朝露……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埋於墓側的定然是墓碑而非墓誌。這是文獻中所見西漢已有墓碑的證例。所見最早的墓碑實物是應孝禹碑，它出土

於山東泗水，現藏於山東省博物館。清光緒《泗水縣志》載：『碑不知圯於何年，經中古人移作墓壙，壙塌而碑復出，則在我泗境也。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宮子行明府宰吾泗（按：宮於同治八年十月上任，次年十一月離去），聞之，昇置學宮。』『後復輦至省垣，今聞在李山農觀察園中。』該碑通高一·九米，寬〇·三二米至〇·四六米，厚〇·二六米。半圓首，正面刻兩鳳鳥畫像及豎綫界格，碑文鑿之於界格綫內。隸書，有篆意。因為此碑時代早，與東漢墓碑有不少差異，故而李文田、康有為、陸增祥皆以為贗品。我們考證此碑為真品無疑。

東漢初年，墓碑不僅數量少，形制也不太規整。杭州西泠印社所藏三老諱字忌日碑，形體稍經修飾，邊綫不整。碑面刻有綫格，碑文綫上格之內，仍保留了西漢墓碑綫刻界格的作風。明、章二帝時期，文獻中常見有碑的記載，《初學記·河北道第五》圭碑條引《水經注》曰：『漢明帝北迴，詔高邑於光武即位建石壇，立圭頭碑。』和帝永元四年（九二年）立有袁安碑，安帝元初四年（一一七年）立有袁敞碑，二碑皆篆書，穿居碑身中部。永建三年（一二八年）又有王孝淵碑，長方形，上半刻人物畫像，下半為碑文，四邊飾斜綫紋。永建六年（一三一年）又有袁良碑，漢安二年（一四三年）有景君碑。景君碑首為圭形，穿居碑身中部偏上。這幾個例子說明，東漢初期圭首碑占多數，穿的位置在碑身中部或中部略偏上。

關於『穿』的解釋，清趙翼《陔餘叢考》引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孫宗鑒《東雜錄》、李綽《尚書故實》等書，認為『古碑皆有圓空，蓋本墟墓間物，所以懸窆者。』『漢去古未遠，猶有豐碑之遺象。』清王芑孫《碑版文廣例》進一步指出：『墓碑之穿所以下棺……漢碑類皆有之。其穿外有暈，其暈繚繞或即自穿中出，或別從穿外起，尚存古制引緯之意。』我們認為，無論宗廟裏、宮殿前的廟堂之碑，還是墓葬前的神道之碑，都有其特殊而神聖的含義，簡單用下棺之碑的名稱或意思來闡釋它們，是理解不了具有豐富思想的、滿腦子『天人相應』、『天人一體』意識的漢人的。這種佔有統治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把世間萬事萬物都與『天』、『地』聯繫起來，融為一體，認為包括人在內的一切事物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天的縮影。因此他們對任何事物，都以『天』、『人』理論作解釋。《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員（圓）下方，以象天地。』班固《兩都賦》云：『（宮室）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圓方。』李賢注：『圓象天，方象地。』把具有神聖意義的碑做成圓首、方座，顯然也是法象『天圓地方』的產物。碑之圓首象徵著天，而穿則意謂著日月，穿上方的暈紋則象徵著日月光環。《史記》裴駟集解引孟康說：『暈，日旁氣也。』《說文》：『暈，日月氣也。』

半圓的天穹下，有日月明照，君父之功美如日月昭輝，永垂天地之間，這不正是漢人樹碑立傳的目的嗎？可見，所謂『暈爲古制引緯之意』的猜說，沒有什麼根據。

把碑首做成圭形者，與法天地的圓首碑不同，它產生的思想根據是圭爲祥瑞之物，屬『五瑞』之一。《白虎通德論·文質》：『何謂五瑞？謂圭、璧、琮、璜、璋也。』『圭以信質……圭以爲信者何？圭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所見，故以圭爲信。而萬物之始，莫不白潔，圭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於東方，陽見於上也。』圭作爲信物，由來已久。春秋時期晉國把盟言書於玉圭之上，稱之爲『盟書』，以取信於他國。圭爲言潔之物，影響著漢代的神主也仿做成圭形。《後漢書·光武帝紀上》：『大司徒鄧禹入長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李賢注曰：『神主，以木爲之，方尺二寸，穿中央，達四方。』可知神主與圭首碑的形制完全一致，只不過有大有小而已。所以我們猜想，圭首碑極有可能模仿了圭首神主，而取其『信』『潔』之意。

東漢中晚期是碑發展的鼎盛期。《宋書·禮志二》曰：『漢以後天下送死者靡，多作石室、石壁、碑銘等物。』劉勰《文心雕龍》云：『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朱劍心《金石學·說石》說：『其時（指東漢）門生故吏，爲其府主刻石頌德，遍於郡邑，風氣極盛。』這種風氣很快把碑的形制、紋飾、碑文體例推向成熟，從而奠定了兩千年碑史的基本模式。在形制上，圭首形碑、半圓首形碑和少數方首形碑都已完備，且碑首、碑身同爲一塊石料做成。穿的位置，也隨著時代的推後，越來越往上移，至晚期達到碑額的題字之下。碑身下端無不置樺，用以安裝在碑趺之卯中。靈帝時期，方形趺座之外又出現了龜趺，如白石神君碑、王舍人碑。二碑龜趺比例得當，雕刻細膩，形象生動。碑的紋飾也有進一步發展，個別圭首碑仍然保留著上期出現的畫像，如王孝淵碑、益州太守碑、柳敏碑、馮緄碑、鮮于璜碑。圓首碑多在穿之上碑首的位置上刻上三道暈紋，少數刻四道或五道，如孔褒碑、義井碑。其方向或左或右，但都偏向一方。暈紋形成的半弧中，即是碑額題字所在。暈紋繼續發展，便在其端部出現了螭首。隨即暈紋也變成了螭身。螭紋的出現，不僅使碑首更具有裝飾性，更主要的則是增加了深層的神聖感和神秘感。葉昌熾《語石》云：『漢碑多蟠螭，唐碑多蟠龍，蟠螭之形有如奔馬四足馳驟，兩龍中間或綴以珠，有雲氣繚繞之。』又云：『王蘭泉紀爨龍顏碑穿上蟠龍，穿左右日月，各徑五寸，日中刻跋烏，月中刻蟾蜍。余所見宋龍昌』

期敕額亦如之。』蟠龍首碑的出現，不再僅僅是禮俗的內容，更成了『權』與地位的象徵。

二 全國漢碑分佈

漢碑能夠流傳至今的十不有一，目前可見到的，其原初位置也不知幾多變動。近人祝嘉曾將歷代著錄中的漢碑輯出約七百餘種，我們統計的數字與之十分接近。然而，其中有確切位置的卻不足三分之一，因此，目前要想瞭解漢碑的分佈，只有依靠所能見到的記錄來進行大體描述。雖然這種描述不可能那麼準確，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反映了漢碑分佈的真實狀況。

文獻裏漢代碑銘所在的位置，其地名已隨歷史的變遷多次更改。按照今之區劃，北至河北蔚縣（有冀州北界碑），南到廣東曲江（有曲江瀧中碑），東抵浙江上虞（有曹娥碑），西達新疆鄯善（有是邦雄桀碑），包括山東、河南、河北、天津、山西、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廣東、陝西、甘肅、四川、雲南、青海、新疆，有十八個省市自治區在漢代曾置立過碑銘，而最集中的是黃河中下游，即河南與山東地區，其次是河北、四川、陝西、山西、湖北，而此外的大部分地區立碑很少，有的僅見一二通。如果把這些碑的原始地點一一考證譯釋為今天的地名，並將其標識在地圖上，就可看出它們較為集中地分佈在如下九個地區。

（一）曲阜中心區

以山東曲阜為中心，東至平邑，西達鉅野，北到東阿鎮，南抵單縣。包括平邑、泗水、曲阜、鄒城、滕州、棗莊、兗州、東平、東阿、汶上、濟寧、嘉祥、金鄉、魚臺、鄆城、鉅野、成武、單縣等十八個縣市區，即漢代魯國、東平國、任城國和山陽郡所在地。該地區中有確切年號的碑有：平邑庶孝禹碑（西漢河平三年）、滕州永元殘碑（永元中）、濟寧山陽麟鳳碑（永建元年）、曲阜陽嘉殘碑（陽嘉中）、濟寧北海相景君碑（漢安二年）、嘉祥敦煌長史武斑碑（建和元年）、嘉祥武開明碑（建和二年）、金鄉班孟堅碑（建和十年）、嘉祥縣從事武梁碑（元嘉元年）、曲阜孔謙碣（歐陽修、趙明誠作孔德讓，永興二年）、曲阜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永興元年）、曲

阜漢魯相韓勅復顏氏繇發碑（永壽二年）、曲阜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永壽二年）、曲阜韓勅修孔廟後碑（永壽三年）、濟寧郎中鄭固碑（延熹元年）、汶上冀州刺史王純碑（延熹四年）、曲阜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金鄉山陽太守祝睦碑（延熹九年）、金鄉祝睦後碑（延熹十年）、魚臺荊州刺史度尚碑（永康元年）、嘉祥執金吾丞武榮碑（永康元年）、成武竹邑侯相張壽碑（建寧元年）、汶上衡方碑（建寧元年）、曲阜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建寧元年）、曲阜河東太守孔宏碑（建寧元年）、曲阜史晨饗孔廟後碑（建寧二年）、金鄉長侯成碑（建寧二年）、鉅野郎中馬江碑（建寧三年）、嘉祥青山碑（建寧三年）、曲阜孔彪碑（建寧四年）、鉅野楊叔恭碑（建寧四年）、單縣漢俠伯咸碑（建寧中）、鉅野李剛碑（熹平元年）、濟寧司隸校尉魯峻碑（熹平二年）、棗莊伯興妻碑（熹平三年）、曲阜孔褒碑（熹平四年）、金鄉薛季象碑（熹平五年）、濟寧鄭季宣碑（中平二年）、東平張遷碑（中平三年）、東平王紛碑（中平四年），加之殘碑和無確切年號者，總數量近一百通，是全國漢碑分佈最密集的地區。

（二）商丘—宿州區

此地區漢碑分佈在河南、安徽、江蘇三省交界的商丘、亳州、宿州、徐州範圍內，包括商丘、睢縣、寧陵、柘城、鹿邑、永城、蕭縣、豐縣、沛縣、徐州、夏邑、蒙城、虞城、宿州、亳州等十五個縣市區，即漢代梁國和沛國的西北大部地區所在。可知確切年號的漢碑有：蒙縣門生沛國蕭劉題名碑（熹平元年）、亳州議郎元賓碑（延熹二年）、亳州費亭侯曹騰碑（延熹三年）、鹿邑老子銘（延熹八年）、亳州曹君碑（延熹九年）、沛縣泗水亭高廟碑（延熹十年）、沛縣漢高祖廟三碑（延熹中）、商丘王子喬碑（延熹中）、豐縣漢高祖感應碑（延熹十年）、夏邑慎令劉修碑（建寧四年）、商丘橋載碑（熹平五年）、亳州曹熾碑（熹平六年）、永城梁相孔耽神祠碑（光和五年）、柘城柘令許君頌（光和中）、亳州幽州刺史朱龜碑（中平二年），加之殘碑及無確切年號者共有四十餘通。

（三）平頂山—許昌區

該地區漢碑分佈西至河南魯山，東抵太康、淮陽，南到鄆城，北達新鄭，包括寶豐、魯山、郟縣、襄城、鄆城、太康、扶溝、淮陽、鄆陵、長葛、睢縣、新鄭、葉縣、漯河、禹縣、平頂山、許昌等十七個縣市區，為漢代潁川郡東部大半及陳留郡西南部、陳國西北部、汝南郡北部一小部分地域。可知確切年號的漢碑有：太康三老袁良碑（永建六年）、扶溝孔子廟碑（建和三年）、扶溝李母塚碑（永興

元年)、禹縣丹陽太守郭旻碑(延熹元年)、鄆陵故民吳仲山碑(熹平元年)、鄆陵尹宙碑(熹平六年)、禹縣太尉郭禧碑(光和二年)、鄆城唐君碑(光和中)、鄆陵楊彥、楊禪二碑(光和中)、葉縣都鄉正衛彈碑(中平二年)、魯山尹儉碑(中平四年),加之殘碑及無年號者共有三十餘通。

(四) 開封中心區

此地區漢碑分佈以河南開封為中心,西至滎陽,東到濮陽,北達汲縣,南抵密縣、修武、新鄉、延津,淇縣也在這個範圍內,是漢代河內郡東半與陳留郡西半區域。可知確切年號的漢碑有:開封西王誨碑(陽嘉三年)、修武池陽令張君碑(延熹中)、濮陽東南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永康元年)、新鄉越碑(建寧中)、淇縣比干碑(建寧中)、濮陽東南帝堯碑(熹平四年)、濮陽東南成陽靈臺碑(建寧五年)、滎陽韓仁銘(熹平四年)、濮陽東廷尉仲定碑(熹平中)、鄭州五部神廟碑(光和四年)、鄭州穀坑君神祠碑(光和四年)、濮陽東南成陽令唐扶頌(光和六年),另有無年號及殘甚不能定名者十多通。

(五) 洛陽中心區

本地區漢碑分佈以河南洛陽為中心,包括新安、宜陽、偃師、孟縣、孟津等五個縣市區,即漢代洛陽城周圍的穀城、河南、偃師、平縣等地。可知年號的漢碑有:洛陽袁敞碑(元初四年)、洛陽太學碑(陽嘉中)、洛陽甘陵相尚府君碑(建和中)、孟縣司隸從事郭究碑(中平元年)、洛陽石經(光和六年)、洛陽太尉劉寬碑(中平二年)、洛陽大石嶺碑(中平六年),另有不詳年號者近二十通,如袁安、光武帝等碑,皆為名碑。

(六) 靈寶—華陰—西安區

本地區以河南靈寶、陝西華陰、西安為東西軸綫分佈,另包括華縣、永濟、芮城、潼關等縣,為漢代弘農郡西部及左馮翊、京兆尹結合部的轄區。年號明確的漢碑有:華陰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靈寶楊著碑(建寧元年)、靈寶沛相楊統碑(建寧元年)、靈寶

繁陽令楊君碑（熹平三年）、華陰彰長斷碑（熹平六年）、華陰西嶽華山亭碑（光和二年）、華陰弘農太守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光和二年）、華陰樊毅修華嶽廟碑（光和二年）、華陰華山祠堂碑（建安中），另有近千種無年號者，其中朝侯小子殘碑（西安）、司馬文預碑（西安）、司徒劉奇碑（華陰）、劉黨碑（華陰）較著名。

（七）南陽—襄陽區

此地區北至河南鎮平，南到湖北襄樊，東抵桐柏，西達鄧縣，包括南陽、內鄉、鎮平、鄧縣、襄陽、襄樊、宜城、內漳、桐柏、泌陽、方城、隨州等十二個縣市區，為漢代南陽郡南部及南郡東北部一小部分轄區所在。有年號的漢碑如：南陽李孟初碑（永興二年）、南陽吉成侯州輔碑（永壽二年）、南陽張景碑（延熹二年）、內鄉陳宣碑（建寧四年）、南陽司空宗俱碑（熹平二年）、襄陽玄儒先生婁壽碑（熹平三年）、襄陽南陽太守秦頡碑（中平三年）、南陽圉令趙君碑（初平元年）、宜城冠蓋里碑（建安三年）、襄陽漢司徒掾梁君碑（建安二十七年），無年號及殘碑石十幾通。

（八）元氏—棗強區

本地區漢碑分佈西至河北元氏縣，東抵棗強縣，包括元氏、趙縣、冀縣、棗強、柏鄉五縣市，是漢代常山國、鉅鹿郡及安平國中南部區域。年號明確的漢碑有：元氏三公山神碑（元初四年）、冀縣冀州從事張表碑（建寧元年）、元氏封龍山頌（延熹七年）、柏鄉蒿長蔡湛頌（光和四年）、元氏無極山神廟碑（光和四年）、元氏三公山碑（光和四年）、元氏白石神君碑（光和六年）、棗強小黃門譙敏碑（中平四年），另有不明年號者五通。

（九）成都中心區

該地區漢碑分佈以四川成都為中心，西至蘆山，東達資中，北到綿竹，南抵夾江，包括綿竹、夾江、蘆山、中江、資中、理縣、成都、什邡、灌縣、彭縣、德陽、廣漢、新津、眉山、雅安，共十五個縣市區，為漢代廣漢郡南部、蜀郡東部、犍為郡北部區域。年號明確的漢碑有：成都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中元二年）、眉山青衣尉趙君羊寶道碑（永初六年）、廣漢長王君石路碑（建和二年）、成都三老楊信碑（和平元年）、蘆山廣漢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延熹七年）、成都孝廉柳敏碑（建寧二年）、資中淳于長夏承碑（建寧

三年）、成都鄭子真舍宅殘碑（熹平四年）、綿竹廣漢太守沈子琚綿竹江堰碑（熹平五年）、理番童子逢盛碑（光和四年）、成都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禮殿記（初平五年）、蘆山巴郡太守樊敏碑（建安十年）、雅安益州太守高頤碑（建安十四年），另有無年號及殘碑石十餘通，其中益州刺史薛君、巴郡太守劉君二人共一碑，是為漢碑殊例，為歷代金石家們注目。

除以上九區域外，山東東半大部、河北蔚縣至廊坊以南區域、山西南部、江蘇北部及西南部、湖南耒陽一帶、陝西南部至四川東北部區域，也曾有少量漢碑。浙江、江西、廣東、雲南、青海、甘肅和新疆只有個別存在，內蒙、寧夏、東北三省、福建、廣西、貴州和西藏未見漢碑出土的記錄。劉勰《文心雕龍·誄碑》云：『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宋書·禮志》載：『漢代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我們覺得，劉勰等人的話委實有些誇張。酈道元作《水經注》，對漢代碑銘的記錄，事實上有將其當作永久性標誌的想法。而『標誌』對於地理學家來講，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即便這樣，他在跑遍全國大部的山山水水之後，僅收錄了一百二十餘種，可以猜想，酈氏所見不過如此。北魏以後千餘年來，漢碑又有了新的出土、新的統計，但總量也不過七百多種。在三分之二的國土範圍內立置幾百通、上千通碑，用『雲起』喻之能算恰當嗎？

漢碑集中分佈的九個區域，與漢畫像石重點出土的地域多是同一的、重合的。這說明漢代墓碑與墓內畫像石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係，甚至可以認為，很多有墓碑的墓主，其墓室極有可能雕刻畫像。目前我們雖然不能一一確指某碑與某組畫像石屬同一墓主關係，但少量實例，例如山東平度灰卜鄉王舍人碑，其主王舍人的墓即是畫像石墓。這足以說明，在厚葬風氣盛行之下，此一推測不無道理。據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國出土的漢畫像石約有一萬塊，比較集中地分佈在四大中心區域：一為山東、蘇北、皖北、豫東區，一為河南南陽、鄂北區，一為四川區，一為陝北、晉西區。這四大區域除陝北、晉西不會有碑銘出現外，其他區域均是漢碑集中分佈的地方。